

# 张浚与岳飞关系再论——兼谈南宋初年的文武矛盾

王 泽 青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绍兴五年至绍兴七年, 张浚与岳飞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到分离的过程。造成这种关系变化的导火索是张浚与岳飞对北伐和淮西兵权归属问题的分歧。岳飞愤然离职的行为使将相不和的矛盾公开化, 突显了当时武将权势地位的膨胀。张浚、岳飞的矛盾逐渐演变为朝廷与武将、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宋代长期文武殊途导致的文武思维差异与崇文抑武的政治传统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文武互信环境, 是导致岳飞、张浚关系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张浚; 岳飞; 文武矛盾; 淮西兵权

DOI:10.3969/j.issn.1674-5035.2022.01.005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35(2022)01-0026-07

岳飞与张浚作为南宋初年的主战派, 原本或可共同抗金, 但他们在2年内就产生了矛盾。学术界在研究岳飞与张浚的关系时, 存在不同观点。首先, 部分学者认为, 由于张浚为人忌刻、气量狭小, 有加害岳飞的倾向, 如杨德泉的《张浚事迹述评》<sup>[1]</sup>、魏隽如的《关于张浚的评价问题》<sup>[2]</sup>、方健的《再论张浚——兼答闫邦本同志》<sup>[3]</sup>、吕变庭的《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sup>[4]</sup>等。其次, 也有主张应将二人矛盾置于宋代防范武人的祖宗家法下考虑, 不能将所有责任推给张浚, 如阎邦本的《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sup>[5]</sup>、王德忠的《张浚新论》<sup>[6]</sup>、黄宽重的《郾城兵变与南宋初期的政局》<sup>[7]</sup>、蔡哲修的《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政治生涯》<sup>[8]</sup>等。第三种观点认为张浚名义上是为收兵权, 实际是欲掌控淮西兵权, 因此与岳飞发生冲突而导致关系不和, 如韩西山的《秦桧研究》<sup>[9]73-75</sup>、何忠礼的《南宋政治史》<sup>[10]72-73</sup>、何忠礼和徐吉军的《南宋史稿》<sup>[11]101</sup>、邓广铭的《岳飞传》<sup>[12]230-241</sup>、王曾瑜的《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sup>[13]173-189</sup>、《岳飞新

传》<sup>[14]199-203</sup>与龚延明《岳飞研究》<sup>[15]138</sup>等。

综上所述, 关于张浚与岳飞关系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 缺乏专门性文章讨论; 第二, 对绍兴七年(1137)前二者关系论述较少; 第三, 对两人关系的讨论更侧重岳飞, 疏于考察张浚态度变化的原因与过程, 即便是专门研究张浚的文章, 也难以避免在情感上对岳飞的偏向。因此, 笔者欲以张浚为主视角来研究张浚与岳飞关系演变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兼谈绍兴初年的文武矛盾。

## 一、张浚与岳飞在平定杨么起义中的合作

荆湖地区是连接四川与东南的中心地带, 一旦不能有效掌控此地, 不仅使中央与四川有隔断的风险, 也会使南宋面临上游门户洞开的危险。杨么起义使南宋的政治势力无法深入洞庭一带。绍兴五年(1135)二月, 朝廷命张浚与岳飞共同平定杨么起义<sup>[16]1614</sup>。绍兴四年(1134)七月, 因岳飞收复襄汉六郡, 朝廷升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 打算让其接替王夔去讨捕杨么<sup>[16]1499-1500</sup>。但此时伪齐和金人联合入侵, 情急之下, 赵鼎奏议复请张浚知枢密院事。当时东南的兵力并不少, 但刘光世、张俊等人畏敌怯战。张浚上任后, 便“请遣岳飞渡江入淮西, 以牵制金兵之在

收稿日期: 2021-10-08

作者简介: 王泽青(1997-), 女, 陕西杨凌人, 在读硕士, 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淮东者，上从之”<sup>[16]1556</sup>。击退金齐联军后，朝廷派都督张浚与早已选中的武将岳飞一起去平定杨么军。

作为最高负责人，张浚首先一改宋军秋冬用兵的习惯，选择在炎夏用兵以破坏杨么军的耕地，使其秋冬有断粮之虞；其次制定了剿抚并用的军事策略，派遣岳飞先赴前线。为防止诸将不能贯彻招抚策略，出现逞兵、杀戮情况，张浚主动请命督战<sup>[16]1669</sup>。岳飞在认同此策略的基础上，灵活地进行招抚工作：

臣遂先分遣军马，扼贼要路，断其粮道，严行禁止博易，使贼乏食。寻遣军分头赍执旗、榜，谕以祸福，说谕招安，溃其腹心，并欲诱致桀黠，以为乡导。<sup>[17]941</sup>

站在张浚的角度来看，岳飞不仅积极地遵循自己的军事策略，而且是很好地加以执行：岳飞行至潭州，军纪严明，对当地秋毫未犯，并积极对“叛军”进行招安。“叛军”多次杀害前来招安的使节，但却不敢杀害岳飞派遣的使节，说明“叛军”对岳飞有所忌惮<sup>[17]337-338</sup>。借着岳飞的威望，张浚“遣制置使岳飞分兵屯鼎、澧、益阳，压以兵势，贼大惊，遂定出降之计”<sup>[17]1717</sup>。黄佐归降后，岳飞将其释放并让其回去进行策反。后岳飞继续实行释俘策反策略，此举使岳家军获得了大量熟悉水战的士兵，弥补了宋兵多北人不习水战的缺点。然而，岳飞释俘的行为引起了席益的猜疑：“岳侯得无有他意，故玩此寇。益欲预以奏闻，如何？”<sup>[17]347</sup>张浚笑着说：“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独不知？用兵有深机，胡可易测！”<sup>[17]347</sup>

虽然，张浚与岳飞都认同剿抚并用，但思维上却有本质差异。张浚关于剿抚的指示为：

乃以便宜命荆、潭、鼎、澧、岳州将逐寨先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领申行府授官，余人给以闲田，贷之种子……其招收人，报所属给种授田，务令安业，候黄诚、杨太、周伦公参了日，当议蠲免租税，补授官资。<sup>[16]1643</sup>

张浚作为文臣，思维方式更具有政治性：用高官厚禄招降叛将可以消弭动乱，组织流民恢复生产可以使地方秩序正常化。岳飞作为武将，思维方式

则更偏军事性：招抚叛将可以弥补己方不习水战的缺陷，也可使己方获得熟悉敌方内情的人员，为后续平定杨么做军事准备。这是岳飞在张浚军事策略上的自我延伸与发挥，但这种思维差异最容易在双方意见有分歧时显露端倪。张浚作为岳飞的上司，是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将失败责任推给岳飞的权力。绍兴五年五月，宋廷召张浚归朝措置防秋大业。张浚临行前与岳飞商讨平定杨么军时，岳飞劝其再多留一些时日，自己即将成功：

有旨召张浚还。浚得诏，谓先臣曰：“浚将还矣，节使经营湖寇，已有定画否？”先臣袖出小图，以示浚曰：“有定画矣。”浚按图熟视，移时，谓先臣曰：“浚视此寇，阻险穷绝，殆未有可投之隙。朝廷方召浚归，议防秋。盍且罢兵，规画上流，俟来岁徐议之。”先臣曰：“何待来年，都督第能为飞少留，不八日，可破贼。都督还朝，在旬日后耳。”先臣曰：“飞请除来往三程，以八日之内，俘诸囚于都督之庭。”浚亦未信。<sup>[17]351-352</sup>

此时张浚与岳飞产生了意见分歧，即张浚是否要因岳飞多留几日，推迟归朝防秋。以往研究在引用这段史料时，更加侧重岳飞用兵的出神入化，而忽略了从张浚的角度思考：

初，张浚至长沙，亲临湖以观贼势，疑未可攻。会有急诏召浚还朝，谋防秋之计。飞至潭州，出示图攻讨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误防秋之期，俟明年再来讨之，如何？”飞请除往来之程，限八日破贼，请浚曲留以俟之，浚然之。<sup>[16]1731-1732</sup>

在这个过程中，张浚显然要因岳飞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张浚所要负责的国防要务事关南宋全局，一旦出现差池，不仅张浚的仕途不保，而且南宋的江山面临被金兵践踏的危险。这是张浚对岳飞“疑”的现实根源。可张浚也被岳飞的自信所打动：若能平定杨么，不仅可以消除内患，也可成为张浚的一项功绩。这是张浚对岳飞计划的“信”的原因。这种矛盾心理原本合情合理，可是张浚上书给宋高宗推迟还朝的措辞，却暴露出其善使官场技巧的一面：

据飞称，旬日之间，可见次第。臣欲更依圣训

起发,虑贼势转炽,将士怀疑,欲俟六月上旬,见得水贼未下,即诏飞来潭州,讫兼程赴行在。<sup>[16]1741</sup>

张浚虽然明面上给了岳飞一定的信任,但在上报朝廷时,却尽力与岳飞划清界限。他一面陈词说自己原本打算前往行在,一面又说自己因前线局势焦灼而无法动身。之所以做此规划,是因为岳飞声称“旬日之间,可见次第”。这就将逾期未平定杨么起义以及延误“防秋大计”的责任推在岳飞身上,为自己留足了政治余地。但这种行为归根到底不是因个人恩怨公报私仇,而是一种“官场智慧”的应用。

最终,张浚与岳飞的合作以成功平定杨么起义画上句号。由于是初次合作,张浚对岳飞始终半信半疑。首先,张浚与岳飞的军事策略一致,都认可采用剿、抚结合的方法平定杨么起义,因此未因意见分歧而产生激烈冲突。其次,正是张浚的首肯才使岳飞获得时间去平定起义。但与此同时,张浚对岳飞又不能做到完全信任,一旦两人利益相悖,张浚不仅不会考虑岳飞的利益,甚至会为求自保而陷岳飞于险境。幸运的是,岳飞在约定期限平定了杨么起义,这才使张浚奏状中暗藏对岳飞的指责未被深究。除此以外,张浚与岳飞虽采取相同的军事策略、执行相同的军事任务,但思维方式却一个偏向政治、一个偏向军事。这种潜在的思维差异也注定了两人日后在合作中会产生意见分歧,从而使二人关系急转直下。

## 二、张浚对岳飞的欣赏

杨么起义的平定使宋廷进一步整合京湖一带的兵力,成功建立起京湖战区。自此,川陕、荆襄形势相连,南宋政府又多了一重保障。张浚的声望因成功平定杨么起义而上升了一个台阶,朝野对张浚措置北伐以实现中兴事业充满期待<sup>[18]4382</sup>。绍兴五年十二月,“张浚始议大合兵为北讨计”<sup>[16]1834</sup>。张浚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协助自己北伐。在平定杨么起义的过程中,岳飞向张浚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得到张浚的认可与称赞:“岳侯殆神算也。”<sup>[17]372</sup>张浚发现岳飞为避荣宠而隐瞒岳云功绩后,主动为岳云请赏:“湖湘之役,岳云实为奇功,

以云乃飞子,不曾保明,乞与特推异数。”<sup>[17]875-876</sup>绍兴五年九月,张浚前往鄂州阅师,发现岳家军军纪严明,军容严整<sup>[17]1566</sup>,完全不同于张俊与刘光世军队的军纪涣散。德才兼备的岳飞不仅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并且愿意听令于朝廷。岳飞恢复中原的志向与张浚不谋而合。绍兴六年(1136)二月,张浚主动向宋高宗引荐岳飞<sup>[17]1340</sup>,并将岳飞纳入自己的军事部署中:

都督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浚于座中独称先臣可倚以大事。乃命韩世忠屯承、楚,以图淮阳,刘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张俊屯盱眙,杨沂中为俊后翼。特命先臣屯襄阳,以窥中原,谓先臣曰:“此事,君之素志也,惟君勉之!”<sup>[17]400</sup>

张浚之所以命岳飞屯襄阳,一方面他认为岳飞可委以重任,另一方面是其他大将已有辖区,不便调动。而岳飞在京湖一带经略多年,谙熟地形。张浚深知岳飞的抗金志向绝非口号。岳飞也认同应主动进攻伪齐以恢复故土:“刘豫僭臣贼子……攻讨之谋,正不宜缓……以臣自料,如及此时,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sup>[17]929</sup>因此,张浚愿意提拔一个与他有共同目标的后起之秀。同年三月,岳飞被升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于襄阳府置司<sup>[16]1876</sup>。由于京湖地区常年战乱,经济凋敝,且与东南粮仓相距甚远,因此粮草的供应成为困扰岳家军的一大难题。张浚担心批粮程序繁琐,耽误岳家军的军粮供应,允许岳家军“除已逐急取拨应副使用外,欲望许臣候支使了毕,具实数奏请除破”<sup>[19]3979</sup>。此时,王彦屯兵荆南,与岳飞军相距较近。王彦的病重使张浚顾虑到:“万一彦死,其众无所统属,所以有并归岳飞之意……欲作书与岳飞,候飞移军襄阳,驻扎定,然后行下王彦除命,及一面召彦前来,则其众已在襄阳,部内不能转动矣。”<sup>[17]1769</sup>张浚相信岳飞有能力管理“八字军”,愿意扶持岳飞壮大军事力量。但因王彦与岳飞的嫌隙而作罢,这表示张浚对岳飞的扶持与认可。绍兴六年七月下旬,岳飞开始从襄阳攻打伪齐,仅1个月,岳飞就进入伪齐境内。张浚向宋高宗夸赞岳飞“措置甚大”<sup>[17]416</sup>。不仅如此,张浚还非常包容岳飞的过错。岳飞在刚被任命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

后，因丁母忧私上庐山<sup>[16]1895</sup>，张浚并未追究岳飞擅离职守的过错，反而主动向宋高宗请御笔敦促岳飞复职<sup>[18]4387</sup>。这与一年后岳飞再次去职上庐山，张浚指责岳飞“并兵、要君”<sup>[20]530</sup>的态度截然不同。

从中原挺进攻打伪齐收复故土一直是张浚军事战略的主线。屯兵京湖战区的岳飞，实际上在张浚军事战略中发挥着先锋作用。正是出于对岳飞的信任与欣赏，张浚才将这个重任交给岳飞。但张浚万万没想到自己器重的得力助手竟与自己产生了分歧，并导致两人关系破裂。

### 三、收淮西兵权：张浚、岳飞矛盾激化

绍兴七年（1137），因刘光世在淮西战事中作战消极，张浚提议罢其兵权。但张浚与岳飞对淮西兵权的归属产生了分歧。有学者认为，张浚拒将淮西兵权交付岳飞存有私心；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从防范武人的角度去思考张浚的行为。笔者认为这两点原因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张浚对岳飞的态度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早在淮西战事中，张浚就已萌生了将刘光世兵权交予岳飞节制的想法：“驾至建康，当轴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吕祉诱胁之，俾请宫祠罢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飞，为北向之举。”<sup>[16]2048-2049</sup>岳飞凭借多年累积的战功和声望赢得朝廷的信任和张浚的赏识。将淮西兵权交与岳飞，不仅有利于加强中央的兵权，而且对抗金也大有裨益。但此时岳飞与张浚意见相左，引起了将相不和的政治矛盾。之后，张浚、宋高宗的反悔也与此有关。

#### （一）张浚、岳飞因北伐而产生意见分歧

绍兴七年三月，宋高宗欲将淮西兵权交予岳飞节制，“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sup>[17]1720</sup>。不久，宋高宗下文书：“岳飞如行军入贼境，有军期事务申奏，待报不及，依已降指挥，许便宜施行讫，具事因闻奏及申都督府。”<sup>[17]1359-1360</sup>虽然朝廷给岳飞更多兵马以及更灵活的行军决策权，但岳家军必须听令于都督府，岳飞始终是都督府的下级将领。就在一个月

以前，宋高宗与岳飞论马后，曾召见张浚，告知自己期望岳飞掌管淮西兵：“飞今见之所进论议皆可取，朕当谕之国家祸变非常，唯赖将相协力，以图大业。不可时时规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费朝廷爵赏。……昨张俊来觐，亦以此戒之。”<sup>[16]2045</sup>宋高宗非常在意将相和睦。可就在张浚前往淮西视师前，张浚、岳飞对北伐产生了意见分歧：

先是，张浚欲征刘豫，会四大将于龟山，问之曰：“欲大举以取刘豫，克复中原，如何？”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浚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至是浚往视师，以淮西之军新易大帅也。<sup>[21]1284①</sup>

合兵北伐一直都是张浚的军事梦想，但这个军事计划在赵鼎、张浚共同执政时，一直没有达成共识。赵鼎因淮西战事下野，正是张浚独揽大权、积极推进自己军事计划的佳期。然而，被张浚寄予厚望且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岳飞却不同意北进。这直接动摇了张浚打算将淮西兵权交付岳飞的决定。《齐东野语》也记载了张浚与岳飞对北伐的分歧：

又张魏公之出督也，陛辞之日，与宋高宗约曰：“臣当先驱清道，望陛下六龙凤驾，约至汴京，作上元帅。”飞闻之曰：“相公得非睡语乎？”于是魏公憾之终身。<sup>[22]239</sup>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飞谓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众横截虏境，使虏不能援，势孤自败，则中原可复。张浚不以为然。”<sup>[16]2051</sup>但这三条史料足以证明张浚与岳飞对北伐意见不同。张浚也由此对岳飞产生了不信任。张浚认为：“人材亦犹是也，但当驾御用之耳。”<sup>[16]2044-2045</sup>人才须得为上所用、为己所用。张浚知道武将不听令于朝廷的危害。张浚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疑虑：岳飞在决策议论时，就与自己意见相左，假使遇到战事，是否会不听令于朝廷，像岳飞这样原则性强的人，恐怕难以驾驭。

#### （二）淮西兵权引发将相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曾两次提醒岳飞要注意和宰相的关系：“谋议之间，要须委曲协济，庶定祸乱。”<sup>[17]1252</sup>“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

给付”<sup>[17]20</sup>。宋高宗在暗示岳飞,淮西兵权的交付必须以尊朝廷为前提。既然淮西兵权还未交付就已经发生了将相不和的问题,那么成功交接后,岂不是给了岳飞叫板宰相的军事资本。宋高宗这一顾虑自然不是岳飞的真实想法,可一旦君臣信任有了裂痕,防备猜忌就在所难免。

绍兴七年夏天,岳飞前往都督府议事,又与张浚意见相左,岳飞又私自去职上庐山:

时王德、郾琼之兵犹未有所付,浚意属吕祉,乃谓先臣曰:“王德之为将,淮西军之所服也。浚欲以为都统制,而命吕祉以都督府参谋领之,如何?”先臣曰:“淮西一军多叛亡盗贼,变乱反掌间耳。王德与郾琼故等夷,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旅,不足以服其众。飞谓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测也。”浚曰:“张宣抚如何?”先臣曰:“张宣抚宿将,飞之旧帅也。然其为人暴而寡谋,且郾琼之素所不服,或未能安反侧。”浚又曰:“然则杨沂中耳。”先臣曰:“沂中之视德等尔,岂能御此军哉。”浚怫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先臣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然岂以得兵为计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归庐山,庐于周国夫人姚氏墓侧。<sup>[17]471-472</sup>

在这次对话中,张浚向岳飞抛出了吕祉、张俊、杨沂中三个人选,在诸多将领中,为何张浚偏偏选中了他们?首先,吕祉在淮西战事中有都督淮西兵作战的经验<sup>[16]1983</sup>;其次,吕祉虽为文臣,可却有着长期接触军务的政治经验;最后,吕祉作为张浚的亲信,一直积极执行张浚的决策。吕祉“所言夸大”的性格正好符合张浚“喜人向前”的用人风格,甚至与张浚好大喜功的性格相似,因此他相信吕祉可以更好地协助自己北伐。总之,任命吕祉的决策,不仅有张浚将个人势力渗入淮西军的私心,也有以文抑武的意图。杨沂中的神武中军在改编为殿前司军后,一直是作为重建三衙体系的军事后备力量<sup>[23]158</sup>,是亲朝廷的一支军队。如果任用杨沂中,可方便日后淮西兵归属朝廷。而张浚则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圆滑人物,在龟山议事时,就表

现出“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的顺从模样,他比岳飞易驾驭,因此更方便张浚主导北伐。

其实岳飞并非不想掌握淮西兵权:“会刘光世乞奉祠,飞乃见上,请由商、虢取关陕,欲并统淮右之兵而行。”<sup>[16]2051</sup>岳飞当面否定这三个人是出于合兵北伐的目的,而非贪恋权力。但他因此私自去职上庐山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张浚。张浚弹劾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实监其军”<sup>[20]530</sup>。陈公辅就此事上奏:

前此采诸人言,皆谓飞忠义可用,不应近日便敢如此。恐别无他意,只是所见有异,望陛下加察。然飞本粗人,凡事终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谓其余大将以兵为乐,坐延岁月,我必欲胜之。又以刘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横截敌境,使敌不能援,势孤自败,则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说……前此朝纲不振,诸将皆有易心,习以为常,此飞所以敢言与宰相议不合也。<sup>[16]2065-2066</sup>

陈公辅否定了岳飞要君的说法,而是从年轻气盛的岳飞自信又不妥协的性格出发,分析了岳飞离职及其与宰相观点相左的行为逻辑。但陈公辅的解释角度也恰恰暴露出岳飞对淮西兵权一事的应激反应的确触碰到宋高宗的敏感处。当李若虚前往庐山请岳飞归职时,就抛出了“相公欲反耶?……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sup>[16]2095</sup>的问题,岳飞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朝廷带来了武将要君之感。

岳飞回朝后,张浚“具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责其不俟报,弃军而庐墓。飞词穷,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飞然之,遂具表待罪”<sup>[16]2096</sup>。这段记载表明,张浚对岳飞的态度是以宋高宗对岳飞的态度为前提的。张浚以上级之姿教训了岳飞的逾矩之举,但只字未提自己与岳飞的私人矛盾。张浚话中之意显然是将处置岳飞的最终权力交给宋高宗,说明此时岳飞、张浚意见不合已不再是私人矛盾,而是朝廷与武将、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岳飞已然成为这组矛盾中的过错方。宋高宗见岳飞后,绵里藏针道:“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sup>[16]2096</sup>虽然宋高宗让岳飞官复原职也未采纳张浚趁机收岳飞兵权的建议,但宋高

宗对岳飞的信任不复从前。

岳飞原本是朝廷信任扶持的武将，但将相不和的问题使张浚与宋高宗对岳飞的信任有了裂痕。而张浚也趁机将自己的政治势力渗入军队中。以往的研究者在对准西兵权引发的张浚、岳飞不和一事上，弱化了岳飞在二人互动中的行为。实际上，人际关系犹如一组力的拉扯，一方的反应往往以另一方的行为为前提。而当人物处在政治环境中时，个体的行动很难不带有政治因素，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政治决策、政治动向。因此，个体情感与性格“私”的一面就会不自觉上升为“公”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又反过来影响个体命运。岳飞在南宋诸大将中洁身自好、瑕疵几近于无，然而，他仅是武将专权环境下的一个特例，宋庭并不会因此而将岳飞与其他武将区别对待。当自身权威受到侵犯时，宋庭就施行防范武人的祖宗家法。

张浚与岳飞同为臣僚，产生意见分歧实属正常，正如建炎年间张浚虽然弹劾李纲，但在李纲下野后，张浚和李纲却能因政治立场相同而相惜。岳珂在《鄂国金佗粹编续编》中曾记录这样一事：“汪澈以御史中丞宣谕荆、襄，诸将与合军陈牒，以讼先臣之冤，澈谕之曰：‘当以奏知。’诸军哭声如雷，皆呼曰：‘为我岳公争气，效一死！’都督张浚、参赞陈俊卿闻之，皆为之悲叹。”<sup>[17]</sup>894-895很显然，张浚对岳飞的个人命运是抱有同情心的，两人的矛盾实被后世所放大。

## 四、余 论

张浚因平定杨么起义而欣赏岳飞，并希望其能协助自己北伐。但两人在北伐和淮西兵权的归属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引发了将相不和的矛盾，使张浚不再信任岳飞。岳飞离职上庐山的举动也使两人的私人矛盾扩大为“武将要君”的政治矛盾。

为了杜绝地方倾覆中央的祸患，南宋对武将怀有较强的戒备心。在这种环境下，文武殊途的思维差异使文臣与武将之间难以建立起一个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这也具体反映在岳飞、张浚的合作——对“剿抚并进”的军事策略的理解与应用、如何进行北伐及对淮西兵归属权的讨论。张浚作为宰

执，他的思维方式更侧重宏观的政治把控，但决策却常常忽略了军事上的具体可行性。岳飞作为武将，虽然擅长军事实操，可又缺乏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和政治全局观。这种将相、文武的思维鸿沟自晚唐五代以降表现得更加严重，“出将入相”不复存在，其根本原因是长期文武殊途导致的圈层固化。

一个政权的主导者如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必站在经济的基础上，将政治与军事协调起来发挥作用。宋高宗对此认识得很清楚，因此，他一再强调“将相和”的重要性。要促成将相齐心抗金离不开双方的共同努力：宰相要有包容心并给武将一定的自主权，武将要忠诚、能战，宰相的策略对的要坚决执行，不对的要相商而动。然而，岳飞、张浚在文武关系敏感、脆弱的环境下，很难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良性合作关系，这不仅与北宋以来长期的文武殊途、崇文抑武所导致的文武矛盾有关，也与两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文武对立导致的将相不和，不仅是张浚、岳飞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也是南宋一道悬而未决的难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抗金的难度。

### 注 释：

- ① 王曾瑜认为这条史料可能是伪作：“此段记载荒诞无稽。龟山在泗州，当运河入洪泽湖口，逼近前沿，似不应在此会议。”见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第473页，中华书局2018版。但笔者认为至少它所记载的张浚与岳飞在北伐上有意见分歧一事并非孤证，如《齐东野语》和《要录》都记载了这一分歧。

### 参考文献：

- [1] 杨德泉.张浚事迹述评[C]//邓广铭,郦家驹.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 [2] 魏隽如.关于张浚的评价问题[J].历史教学,1990(12):2-5.
- [3] 方健.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M]//汪圣铎,金锋,李晨光.岳飞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
- [4] 吕变庭.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0-16.
- [5] 阎邦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J].四川师范学院

-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3-12.
- [6] 王德忠.张浚新论[J].东北师大学报,1992(3):52-56.
- [7] 黄宽重.酈琼兵变与南宋初期的政局[C]//中华书局编辑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9.
- [8] 蔡哲修.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政治生涯[M]//王明荪.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三编:第16册.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0.
- [9] 韩酉山.秦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0] 何忠礼.南宋政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1] 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12] 邓广铭.岳飞传[M].上海:三联出版社,2017.
- [13] 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 [14] 王曾瑜.岳飞新传[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 [15] 龚延明.岳飞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7] 岳珂.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M].王曾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
- [18]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六)[M]//曾抗美,徐德明,点校.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9]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20]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22] 周密.齐东野语[M].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3]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M].北京:中华书局,1983.

Th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Generals and Prime Ministers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Taking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E Fei and ZHANG Jun as an Example

WANG Zeqi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5th year to the 7th year in Shaox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Jun and YUE Fei went through a process from cooperation to separation. The fuse that caused the change in their relationship was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ZHANG Jun and YUE Fei on the issue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the issue of military power in Huaixi. YUE Fei's angry resignation made the conflicts public, highlight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position at that time. In the e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ZHANG and YUE that could have been resolve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military commanders, and between Emperor Gaozong and YUE Fei. The fundamental reason that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e Fei and Zhang Jun was, in fact, the long-term differences in civil and military thinking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status of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valuing the intellect and belittling military officers failed to provide a good environment of mutual trust between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Key words:** ZHANG Jun; YUE Fei; disagreements between civilian and military officials; Huaixi military power

(责任编辑 闫丽环)